

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 作用的代际差异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郭云涛

【摘要】文章以农民非农初职为研究对象,用 Kaplan-Meier 估计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描述与分析了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初职间隔比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更短;人口特征等相关变量对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影响各不相同,对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解释力更强,而对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解释力较弱。这说明,与老一代农民相比,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其非农职业流动已经具有不同的流动特征,需要加以独立考察。

【关键词】农民 非农初职间隔 代际差异

【作者】郭云涛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民不再从事传统农业,转而外出务工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等非农职业。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过程包括迁移、求职、转职、回流(退出)等一系列环节。在农民工领域的早期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农民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迁移、求职等环节。近年来,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回流现象。但是,对于农民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转职行为,学界关注相对较少。李强(1999)认为农民工的转职较为频繁,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发现,工作环境、收入和家庭责任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频繁转职的主要原因。周运清、王培刚(2002)总结和归纳了进城农民工转职的基本特点;蔡昉等(2005)解释了制度约束下农民工频繁转职的经济意义;严善平(2006)则分析了制度约束等因素对城、乡工人转职过程的不同影响。可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约束与农民工转职”这一议题。

然而,代际间的“代差”是转型社会中年龄群体间的显著特征之一,随着“80后”新生代农民逐渐走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新生代农

民的流动特征及其代际差异问题。白南生、李靖(2008)利用北京市 700 多名农民工流动史资料分析了农民工的转职过程,指出新、老两代农民工之间在离职原因上存在显著差异。符平(2009)以目的性抽样方式获得的 270 份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历程。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不断地寻找发展机会,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因此,其流动轨迹呈倒“U”形,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

当前农民或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经历研究领域呈现出以下特征:(1)从研究主题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约束与农民工转职”,对新生代农民的流动特征及其代际差异这一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2)从研究者利用的数据特征来看,以往收集的数据以截面数据为主,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对农民的职业间隔等“事件史类型”数据的收集(白南生、李靖,2008);(3)在研究方法上,数据特征的约束使得已有研究者不能用事件史的相关方法对农民工流动历程进行准确、细致的量化描述与分析,而只能用相对粗放的方式来探讨上述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拟以“2006 全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6)”为基础,用 Kaplan-Meier 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等事件史方法来描述、分析农民非农职业的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

二、数据、研究方法与变量

(一)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均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该调查是对除港、澳、台、西藏、青海、宁夏之外的省份的城、乡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样本总数为 10 151 个。本研究对象为从事过非农职业的农民,因此,需要对该数据的个案进行筛选。具体筛选过程为:在“CGSS2006”数据所抽样的个案中,选择同时满足当前户口为“农村户口”和“从事过 3 个月以上非农职业”的农民,最终获得 1 303 个个案,其中,老一代农民 1 061 人,新生代农民 242 人,相关案例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 研究方法与变量

本研究中,因变量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动态变量。传统的 OLS 回归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很好地处理随着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 Kaplan-Meier 来估计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比较其代际差异,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拟合各因素对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影响。

1. 因变量

在调查问卷中通过问题“您的第一份非农工作是从哪年开始到哪年结束”来获取有关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相关信息。在本研究中,用“是否转职”,即到 2006 年,受访者是否发生

表 1 样本中相关案例的基本特征

变量	整个农民群体			新生代农民群体			老一代农民群体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转职状况									
是	802	62	62	150	62	62	652	61	61
否	501	38	100	92	38	100	409	39	100
是否为 80 后	242	19	—	—	—	—	—	—	—
性别									
男	821	63	63	116	48	48	700	66	66
女	482	37	100	126	52	100	361	34	100
职称状况									
有	235	18	18	41	17	17	194	18	18
无	1068	82	100	201	83	100	867	82	100
管理位置									
是	143	11	11	18	7.4	7.4	125	12	12
否	1160	89	100	224	92.6	100	936	88	100
单位类型									
企业	378	29	29	77	32	32	301	28	28
个体经营	743	57	86	150	62	94	603	56	84
社会团体	182	14	100	15	6	100	157	16	100
初职间隔(年)									
0	158	19.7	19.7	48	32.0	32.0	110	16.9	16.9
1	183	22.8	42.5	46	30.6	62.6	137	21.0	37.9
2	103	12.8	55.4	27	18.0	80.6	76	11.7	49.6
3	63	7.9	63.2	9	6.0	86.6	54	8.3	57.9
4	66	8.2	71.4	10	6.7	93.3	56	8.6	66.5
5+	229	28.6	100.0	10	6.7	100.0	219	33.5	100.0
合计	802	100.0		150	100.0		652	100.0	

转职行为,作为事件状态,引入模型时,被编码为“1=是,0=否”。

2. 自变量

农民代际差异是引入模型的自变量。在农民工研究领域,关于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王春光,2001;符平,2009)。本文以出生年代为界限,把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引入模型时,设置为虚拟变量,“1=80后,0=其他”。

有研究认为,“性别”、“初职年龄”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民非农职业的转职(李强,2004)。因此,本研究也把上述人口特征变量引入模型。“初职年龄”指受访者从出生到非农初职工作开始时,受访者的岁数;性别变量被设置为虚拟变量,“1=男性,0=女性”。

从理性选择论的角度看,人力资本较高者更有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与那些担任管理职位、在较好的单位中工作者相似,其转职的成本更高,因此,“是否有职称”、“受教育年数”等人力资本因素和“管理位置”、“单位类型”等初职地位因素也可能对农民非农初职间隔

产生影响(李强,2004;蔡昉、白南生,2006)。其中,“是否有职称”是指受访者在从事非农初职时,是否有技术或职称,引入模型时设置为虚拟变量,“1=有,0=无”;“受教育年数”是指受访者从小学开始所受的学校教育的年限;“管理位置”是指受访者在从事非农初职时是否担任管理职位,引入模型时设置为虚拟变量,“1=是,0=否”;“单位类型”指受访者非农初职的单位类型,在本研究中分为“企业”、“个体经营”和“其他社会单位团体”3种类型。在模型中设置为虚拟变量,以“企业”为参照项。基于此,本研究把上述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和初职地位等特征变量引入模型,作为研究变量。

三、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代际差异

在描述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代际差异之前,有必要简要地描述引入模型的相关变量的基本特征及其代际差异。

(一) 农民非农初职时相关特征的代际差异

从表1、表2的统计描述中发现,在人口特征方面,“初职年龄”的代际差异较为明显,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的平均年龄为27岁左右,而新生代农民仅为18岁左右;在性别方面,老一代农民从事非农工作的主要是男性,占样本数的66%,而在新生代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群体中,男性仅占48%。可见,在人口特征方面,新、老两代农民群体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有向低龄化和两性均衡发展的趋势。但是,在人力资本特征方面,新、老两代从事非农初职的农民则不存在较大差异:在“受教育年数”方面,老一代农民为7.5年左右,而新生代农民也仅为8.6年左右;在职称、技术方面,老一代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中,有职称、有技术者为18%,新生代农民则为17%。新、老两代农民在人力资本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表明,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没有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普及而有明显提高,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表2 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等相关变量的代际差异

变 量	整个农民群体			新生代农民群体			老一代农民群体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初职间隔	1303	13.41 (5.00)	0.58 (0.44)	242	3.74*** (2.00)	0.28*** (0.356)	1061	14.45*** (7.00)	0.63*** (0.64)
初职年龄	1303	25.25	10.02	242	17.76	2.79	1061	26.96	10.29
受教育年数	1226	7.67	2.52	237	8.59	1.91	989	7.45	2.6

注:“初职间隔”变量为Kaplan-Meier估计值,其中括号中的数字为中位数及其标准差;***表示 $p < 0.001$ (双侧检验)。

在初职地位方面,老一代农民在从事非农初职工作过程中,处于“管理位置”的比例为12%,要高于新生代农民的7.4%。而在非农初职工作单位类型方面,从事个体经营是农民的

首选(57%),在企业工作次之(29%),在各级政府等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最少(14%);在代际方面,新生代农民从事个体经营者为62%,在企业中工作的比例为32%,都要相应高于老一代农民的56%和28%,在社会团体中工作的比例(6%)则要低于老一代农民(16%)。

总之,从农民非农初职的代际趋势来看,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有向低龄化、两性均衡发展的趋势,但人力资本水平的累积、提高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在非农初职选择过程中,两代农民从事个体经营是其首选,去企业工作是其次要选择。

(二) 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代际差异

笔者将从农民非农初职转职状况、初职间隔的总体特征和初职间隔的具体分布等3个方面来描述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代际差异。

首先,在农民非农初职转职层面,代际之间在转职率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从表1可以发现,在1303个案例中,有802个案例的非农初职截止到2006年至少经历了初职转职,但仍有501人(38%)没有转职。可见,有近2/3的农民有过转职经历,但依然有超1/3的农民在从事非农工作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转职行为。其中,在老一代农民中,非农初职已转职的有652人,没有转职的有409人(39%);在新生代农民中,非农初职已转职的有150人,没有转职的为92人(38%)^①。可见,代际之间在转职率上并没有明显差异。

其次,在初职间隔的总体特征方面,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的非农初职间隔长于新生代农民。

表2的数据表明,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均值为13年左右,中位数为5年。其中,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均值为14年左右,中位数为7年;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均值为4年左右,中位数则为2年。在自由度为1的情况下,其 $P < 0.001$ 。可见,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Kaplan-Meier估计表明,老一代农民的非农初职间隔显著地长于新生代农民的初职间隔。

最后,在初职间隔的具体分布方面,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分布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在“0~2年”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而在“5年及以上”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则远低于老一代农民。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大约有158个(19.7%)农民会转职,工作满1年的有183人(22.8%),工作满2年的有103人(12.8%),而工作满5年及以上者有229人(28.6%)。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在0~2年的累积百分比为55.4%。

从表1可以发现,在代际层面,新、老两代农民在非农初职间隔的具体分布上存在一些差异。在老一代农民群体中,非农初职间隔不满1年就转职者占样本数的16.9%(110人),而新生代农民群体则为32%(48人)。新生代初职间隔满1年者占样本数的30.6%(46人),老一代则为21%(137人)。老一代农民中,初职间隔满2年的占11.7%(76人),新生代农民则为18%(27人)。在0~2年初职间隔期内,约有49.6%老一代农民发生了转职,而新生代

^① 分别指老一代农民工样本和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

农民转职率则高达 80.6%。初职间隔另一个明显的代际差异表现在“5 年及以上”的初职间隔期内。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满 5 年及以上者占 33.5%，远高于新生代农民群体的 6.7%。可见，从样本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明显更为短暂。在自由度为 5 的情况下，Pearson 和似然比卡方值分别为 55.28、64.05，其 $P < 0.001$ 。这表明，新、老两代农民在非农初职间隔的具体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农民非农初职虽然在转职率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初职间隔的总体特征和具体分布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在总体特征方面，老一代农民的非农初职间隔长于新生代农民；在初职间隔具体分布方面，新生代农民在“0~2 年”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而在“5 年及以上”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则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其原因可能与两代农民的初职年龄相关联。与成年才从事非农工作的老一代农民相比，初职年龄显著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在从事非农初职工作过程中，其行为选择更具盲动性，因此，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其初职间隔更为短暂。

四、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

下面主要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从事非农工作农民的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和初职地位等相关变量对非农初职转职风险率的具体影响。为检验代际变量对农民非农初职转职的动态影响，先将所有样本纳入模型；随后为比较两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的相关影响因素作用的异同，针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分别构建了模型，通过对引入模型相关变量系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关影响因素对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作用的代际差异。

从表 3 可以看出，由于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初职转职呈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使引入模型的相关因素对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表 3 农民工初职间隔及其代际差异的 Cox 回归分析

	整体模型	老一代农民模型	新生代农民模型
是否为 80 后	0.596***(1.815)	—	—
是否为男性	0.007(1.007)	-0.031(0.969)	0.060(1.062)
初职年龄	-0.012*(0.988)	-0.011*(0.989)	-0.029(0.972)
受教育年数	-0.036*(0.964)	-0.045***(0.956)	0.055(1.056)
是否有职称	-0.502*** (0.605)	-0.499*** (0.607)	-0.559*(0.572)
管理位置	-0.279*(0.756)	-0.182(0.833)	-0.920*(0.398)
单位类型(参照项:企业)			
个体经营	-0.474*** (0.623)	-0.541*** (0.582)	-0.238(0.788)
其他团体	-0.145(0.865)	-0.214*(0.807)	0.259(1.296)
样本数 / 事件数	1303/769	1061/622	242/147
卡方 / df	130.01/8	80.00/7	15.74/7

注：括号中的值为 $\exp(B)$ 值；#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侧检验）。

首先，从个体内在的流动动机来看，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流动动机的差异使得“初职地位”等因素对两代农民的非农初职转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两代农民在非农初职的流动动机上是存在代际差异

的。已有研究认为,外出赚钱以更好地履行家庭的经济责任是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动因(李强,2004;蔡昉、白南生,2006)。这一流动动机使得影响收入的相关因素对老一代农民的初职转职都会产生显著影响。

工龄是影响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过于频繁的转职行为会对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明瑟,1974)。因此,频繁的转职行为对于较为成熟、家庭责任意识较为强烈的老一代农民而言,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而个体的成熟程度和家庭责任意识是与年龄相关的。因此,“初职年龄”对于以赚钱为目的的老一代农民群体的初职转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初职年龄”每增加1岁,农民非农初职转职风险率就降低1.1%。单位类型是影响收入的另一因素,从事个体经营所获得的收入要比在企业打工获得的收入高,因此,在老一代农民群体中,非农初职工作的“单位类型”对于转职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非农初职从事“个体经营”者转职的风险率仅为在“企业”中工作的农民的58.2%。

然而,新生代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动机却更复杂。老一代农民的辛勤劳动为新生代农民创造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履行家庭经济责任的压力更小,意识更淡薄,但个体自我发展和休闲意识却更为强烈,因此,新生代农民的家庭经济责任意识普遍偏弱。对于未成年就从事非农初职的新生代农民而言,年龄的增加往往不会增强他们的家庭经济责任意识;而对于农民所从事的非农职业而言,无论是在哪种单位工作,都是辛苦、单调而无趣的;因此,“初职年龄”和“单位类型”并不会对他们的非农初职转职产生显著影响,他们希望通过频繁的转职来发现更适合自己、对自我发展有利的非农职业机会。在非农初职过程中,担任管理位置有利于锻炼自身的能力,对自我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符平,2009)。因此,“是否担任管理职位”对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具有显著影响,不论在哪个行业中,那些在非农初职过程中就担任管理职位者转职的风险率仅为不担任管理职位者的39.8%。

上述分析表明,老一代农民从事非农初职的动机是赚钱以更好地履行家庭经济责任,而新生代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动机是多元的,他们希望在流动过程中找到有趣、能增长见识、有利于自我发展的非农职业机会。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流动动机的差异使初职地位等因素对两代农民的非农初职转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其次,在外在环境方面,教育的发展和非农职业从业要求的代际差异使人力资本要素对两代农民非农初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老一代农民初次走向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时,在农民群体内部,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较大,因此,“受教育年数”对老一代农民群体的转职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初职转职风险率降低4.4%。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初次走向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9年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学扩招,每年数百万的大学生涌向劳动力市场。这使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增加

的同时,也使新生代农民受教育程度更为平均^①,难以凸显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且还要承受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冲击,因此,教育对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很难产生显著影响。

老一代农民群体从事非农初职的过程中,非农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大部分职业,尤其是在企业中,基本上是从从事劳动强度大的工种。但是,当新生代农民从事非农初职工作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有技术、有职称的劳动力。因此,虽然“有职称、技术”变量对两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都有显著影响——对于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为“-0.499”,对新生代农民的影响为“-0.559”,但显然对于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影响更大。这说明,非农职业从业要求的代际差异使得“职称、技术”对新生代农民的流动历程影响更大。

教育的发展、非农职业从业要求的代际差异等外在就业环境的变化使人力资本要素对两代农民非农初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老一代农民群体从事非农初职的时代,农民群体内部教育异质性较大,因此,受教育年数对老一代农民非农初职间隔有显著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没有影响;而非农初职时从业要求变化的代际差异使“技术、职称”变量对新生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的影响更大。

再次,农村非农职业流动文化的建构使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初职流动往往是“为流动而流动”,使流动更具盲动性。

在农村社会经历了30余年的打工潮后,农民从事非农职业蔚然成风。因此,对于那些不能继续升学的新生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不再是或不再仅仅是一种出于经济目的或个人发展考虑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一种在农村社会已经建构的、具有“理所当然”性质的“流动文化”驱动的习惯性行为。这使得在这种流动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新生代农民非农职业流动往往是“为流动而流动”。因此,表现在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上,在“老一代农民”模型中,在自由度为7的情况下,其卡方值为80。而在“新生代农民”模型中,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急剧下降,在自由度为7的情况下,其卡方值仅为16左右。这表明,从模型整体来看,引入模型各变量对“老一代农民”的解释力更强,对新生代农民的解释力较弱。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新生代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呈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建构于老一代农民之上的模型很难预测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初职流动。这说明,新生代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加深对新生代农民非农职业流动的了解。

五、结 论

本研究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Kaplan-Meier估计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农

^① 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6年左右,但标准差为1.9年;老一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5年左右,但标准差却为2.6年。可见,虽然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更多,但标准差却更低。这说明,普及9年义务教育,使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增加的同时,也使新生代农民受教育程度更为平均。

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通过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代际差异方面,农民非农初职虽然在转职率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初职间隔的总体特征和具体分布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在总体特征方面,老一代农民的非农初职间隔长于新生代农民;在初职间隔具体分布方面,新生代农民在“0~2年”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而在“5年及以上”初职间隔期内的相对频次则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在相关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方面,两代农民在流动的动机、外在环境和流动文化特征等方面都呈现出代际差异,使相关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老一代农民从事非农初职的动机是赚钱以更好地履行家庭经济责任,而新生代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动机是多元的,他们希望在流动过程中找到有趣、能增长见识、有利于自我发展的非农职业机会。新、老两代农民非农初职流动动机的差异使初职地位等因素对两代农民的非农初职转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2)教育发展、从业要求的变化等外在非农初职就业环境的代际差异使人力资本要素对两代农民非农初职转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3)农村非农职业流动文化的建构使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初职流动更具盲动性,更难预测。

总之,本研究表明,与老一代农民相比,新生代农民的初职间隔更为短暂,其非农初职流动已经具有不同的流动特征,因此,需要加以独立考察,以加深对新生代农民非农职业流动的了解。上述结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作用代际差异的量化描述、分析,使我们对新、老两代农民流动经历的差异有了更为准确、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农民非农职业流动经历的代际差异研究。但由于数据的局限,在探讨农民非农初职间隔的影响因素中,本研究并没有引入初职时的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和劳动环境等重要因素。此外,农民非农初职与再职之间既存在连续性、相似性,但也有其各自特征,因此,农民非农再职间隔及其流动历程的代际差异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李靖(2008):《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2. 蔡昉等(2005):《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
3. 蔡昉、白南生主编(2006):《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符平(2009):《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12期。
5. 李强(1999):《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3期。
6.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7. 严善平(2006):《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管理世界》,第8期。
8. 周运清、王培刚(2002):《农民工进城方式选择及职业流动特点研究》,《青年研究》,第9期。

(责任编辑:朱犁)